

后现代地理学： 数字时代文学批评的困境与策略

黎杨全

当批评家的目光转向网络世界,他首先会遭遇传统批评未曾遭遇的深刻困惑,即他面对的将是海量的文本。批评对象不再清晰、有限和规整,而是丰富、驳杂而无序。在这一刻,批评者如置身于浩瀚的“迷宫”与“海洋”——这就是所谓的“赛博空间”,深感无力掌控而手足无措。白烨认为,在网络文学面前,传统批评范式呈现出“有限性”,表现在“一个日渐缩小的批评在面对一个不断放大的文坛”,作品数量太多,批评家难以找到“点”^{〔1〕}。洪治纲认为,数字媒介造成了批评家“甄别的无序”。一方面,批评者要在海量的文字中甄别文学与非文学;另一方面,“点击率的时尚化、商业化又使其丧失了基本的区分作用,故批评者既‘无法从所有原创作品迅速有效地确立批评对象’,又‘无法借助网络自身的‘点击率’来实现目标的甄别’”^{〔2〕}。如何在赛博空间中顺利航行、定位而不致无所适从,就成为文学批评在这个超空间里必须要解决的后现代地理学。

一、赛博空间、“精神分裂”与“表征”危机

在传统文学批评中,“空间”并未成为理论焦点,人们关注发展、迷恋历史,空间被理解为给定的、稳

固的广延物体,这导致了一种厚此薄彼的偏见:“空间被看成是无生命的、固定的、无辩证的、静止的。与此相反,时间被理解成丰富多产的,有生命的,辩证的。”^{〔3〕}现代地理学在根本上也就被理解成对事实材料的收集、分类以及理论上的单纯表现,而这些材料只是描述、阐释地球表面的地区差异。然而随着现代城市空间的拓展与媒介技术对世界的网络化、一体化,“空间”问题及其引发的“表征”危机日益为理论家所重视。福柯、列菲伏尔都强调空间的重要性,后者反驳了那种把空间理解成一个“业已存在”、“等待填塞的容器”的传统观点,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性的生产^{〔4〕}。詹姆逊讨论了空间的演进带来的日趋尖锐的“表征”危机。在与市场资本主义相联系的古典的、笛卡尔式的无限等价和延伸的几何空间中,个人的直接经验尚能有效地支配与包容相应的经济、社会形式。自垄断资本主义起,开始出现“本质与现象”、“结构与生活经验之间”的对立。到了晚期资本主义,资本的飞速扩张使得跨国网络得以形成,个人生活的现象学描写与生存条件的结构模式之间产生了更为激烈的矛盾,个体经验难以捕捉那个终极的“缺场的原因”^{〔5〕}。

数字媒介带来了空间范式的根本性的变革。它

促进了全球的网络化、一体化,促成了后现代的空间文化,同时它本身也形成了并置性、缠绕性的虚拟空间,而不再是广延性、稳固性的物质存在。它是形成性的,主体的操控伴随着赛博空间重构与瓦解的过程。随着链接的渐次打开,一个个空间就纷至沓来,然而关闭网络与电脑,这些虚拟空间又不复存在。这瓦解了传统的“主客体二分法”,“因特网的屏幕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通过‘连接’而与其融为一体的一个活动的主体性的延伸”⁽⁶⁾。在赛博空间中,不计其数的文本在批评家面前瞬时呈现,这是全新的时空体验,历史、叙事和记忆的感觉急剧衰退,转而遭到“空间逻辑的支配”。⁽⁷⁾这正造成了詹姆逊所说的“个人生活的现象学描写与生存条件的结构模式之间”的深刻裂痕,这种裂痕,也正是批评家面对网络海洋时的深刻困惑与“表征”危机。

当批评家在赛博空间中漫游时,他不断地点开链接、寻找与发现,这是一个目不暇接的“历险”的过程,这与本雅明笔下现代城市空间中的生存体验颇为相似。本雅明分析了巴黎这个大都市的拱廊街。逛街者在拱廊街中不停地穿梭、驻足,人群、商店、橱窗、货物不断地扑入眼帘,让他感觉如身陷迷宫。赛博空间是更为复杂的拱廊街,在批评家面前的,是四通八达的路径,各色的网站、论坛与链接,眼花缭乱的文字、图片、音乐、游戏与广告。在此意义上,批评家可能会遭遇本雅明所说的“惊颤体验”。拱廊街中的逛街者在湍急的人流中匆匆前行,他们需要对付纷至沓来的各种现象作出快速反应,总在体味扑面而来的惊颤体验,这种体验“就像报纸广告或大城市交通给人的感觉一样”,“在其中穿行便会给个体带来一系列惊恐与碰撞”。⁽⁸⁾在此意义上,这如同“击剑”,批评家欲在意料不到的各种出击中获得生存,从而“为自己在人群中打开一条通道”⁽⁹⁾,由此,传统批评的“光晕”与凝神观照的能力会遭到不可避免的毁灭,悠远绵长的体验与思考将让位于快节奏的即时体味。在拱廊街的行人中,有一群休闲逛街者,他们以轻松、悠闲的心态在街上闲逛,饶有兴趣地观察、寻找,对他们来说,纷扰的拱廊街成了温馨的居所:商业招牌如同客厅墙上挂的油画,街道房间的墙壁成为他的书桌,书报亭成为他的图书馆,而咖啡店的露台则是他工作之余俯视他那居家感的角落⁽¹⁰⁾。批评家也可以成为休闲逛街者,他在网站、论坛驻足、留连,寻找、品味感兴趣的文字、作品,甚至可以注册,成为论坛的用户,拥有一个或几个虚拟寓所。在

此期间,他可能会被一些无关紧要的图片、音乐、广告等非文学的内容所吸引,但这正是悠闲与轻松的特征。

人们经常用信息高速公路来喻指互联网,强调其速度的快捷,同时又常称其为“迷宫”或“海洋”,强调它立体的、复杂的建筑学意味,这与詹姆逊常以建筑来分析后现代空间是一致的。詹姆逊认为“建筑艺术”正是当今“后现代美感典范”的“最佳表现”⁽¹¹⁾。在某种意义上,赛博空间中批评家的精神状态与人们在后现代建筑中的认知体验是极为相似的。

詹姆逊以位于洛杉矶的波拿文都拉宾馆来说明后现代空间中的生存体验。当他进入这座复杂的、迷宫般的建筑时,“不能想象这个空间应该是什么样的”,他情不自禁地“全身心地浸没”在这个超空间,“晕头转向、不辨方向”⁽¹²⁾。这与批评家在赛博空间的体验相似,当点开一个链接,他就打开了一个波拿文都拉宾馆,他会在毫无征兆的前提下面临时间性的突然瓦解,被眼前此起彼伏、支离破碎的形象所笼罩,从而“晕头转向”。这种体验,正与批评家的“浸没”、距离感的消失有根本的关系。当陷身于互联网,暴露在“感知的直接攻击”之下,一切中介与掩蔽的层面都在这种攻击面前被摧毁殆尽。这带来了深刻的“无方位性”⁽¹³⁾。

批评家失去了“方位感”,这种历史性的危机也就是詹姆逊所说的“示意链的崩溃”,即主体难于在被空间逻辑所主宰的文化中组织自我的时间感,而这是主体获得清醒意识与个人身份的前提。批评家在网络中不断地点击链接,实际上他总处于“精神分裂”状态,因为链接是非线性的,是对线性逻辑结构的破坏,消解了“句子的功能”,主体无法将精神生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统一起来,构成连贯的意义,全部经验都成为纯粹的、互不关联的即时体验,无法构成一种运动⁽¹⁴⁾。这种“精神分裂”,也就是詹姆逊所说的“歇斯底里式崇高”。崇高的对象是无形式无限制的,如大海或星空,面对它,人不由自主地感到战栗与渺小。如果说传统批评面对的总是有限的、确定的文本,网络文学批评面对的则是无限量的作品。在这无限的迷宫与海洋面前,批评家的确会产生渺小与挫败之感。然而,这不是面对伟大事物时心灵深处的震撼,不是心醉神迷的沉浸,而是精神分裂的、歇斯底里式的崇高体验。在这种精神分裂中,批评家无法把握现实,失去了方向感,陷入了根本性的“表征”危机。

二、“深海采珠人”与寓言式批评

在赛博空间的迷宫中,面对海量的文本,批评家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以应对“表征”的危机。在这方面,我们同样可以从这些对空间有精彩论述的思想家那里得到启示。

在本雅明看来,当逛街者在拱廊街的人群中穿行时,他可能会面临着自我的消失,个人痕迹在人群中变得暧昧不清。与此同时,面目模糊的大众构成了一个“避难所”,使得那些背离社会的人得以躲藏。这对当局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增加了掌控个体的难度^{〔15〕}。一部有个性的作品,或者离经叛道的作品,当它置身于海量的文本中时,它极有可能会被遮蔽、被忽视,沉入海底而湮没无闻。批评家就必须养成在集群式的文本中去发掘那些有特色、有价值的作品的习惯。因个人隐匿在人群中而导致个人痕迹的消失,这带来了某种富于想象的神秘意味。正是这种神秘意味,让侦探小说得以兴盛。“侦探小说最初的社会内涵是使个人痕迹在大都市人群中变得模糊。”^{〔16〕}意欲在模糊的人群中寻觅、辨认个人痕迹,这就需要侦探家警觉的眼睛与善于发现的能力。赛博空间中的批评家也必须成为“侦探家”,带着警觉与戒备,培养“快速领悟的能力”,捕获那些稍纵即逝的东西。

赛博空间中批评家是“侦探家”,也可能是“拾垃圾者”,但却是在寻找有用之物。本雅明写道:“当新兴工业的发展使废旧物也具有特定再利用价值时,越来越多的拾垃圾者便开始在城市里出现。”^{〔17〕}他发现波德莱尔曾写过一本有关拾垃圾者的散文集,其中这样描写:“此地有这么个人,他在首都收捡前一天的垃圾,任何被这个大城市扔掉,被它鄙弃、被它踩在脚下碾碎的东西他都分门别类地收集起来,……他对它们进行分类,做出精明的取舍,如此这般宛如一个守财奴看护着他的财宝。”在本雅明看来,这段描写是“对波德莱尔心目中诗人创作活动的一种绝无仅有的夸张的隐喻”^{〔18〕}。显然,“拾垃圾者”也是赛博空间中批评家的绝妙隐喻。他如同拾垃圾者那样孤独地从事自己的事业,迈着“僵直的步态”,左顾右盼,随时准备停下来审视、分辨遇到的可能变废为宝之物。因此,对批评家来说,他不断地在赛博空间中穿行,一方面是接连不断的惊颤体验,一方面必须用肉体与自我打开一条道路,去寻找宝藏,这就像是“一场搏斗”^{〔19〕}。借用波德莱尔诗篇《太阳》来形容:“沿着古老的市郊,

那儿的破房/都拉下了暗藏春色的百叶窗/当毒辣的太阳用一支支火箭/射向城市和郊野/屋顶和麦田/我独自去练习我奇异的剑术/向四面八方嗅寻偶然的韵律/绊在字眼上,像绊在石子路上/有时碰上了长久梦想的诗行。”^{〔20〕}太阳的一支支毒箭,隐喻批评家面对纷涌而至的刺激所产生的惊颤体验,练习剑术则隐喻“幻想的格斗”,即抵御这种刺激的努力,与此同时,到处去寻找“偶然的韵律”,如果足够幸运,就能碰到“长久梦想的诗行”,寻找到自己心仪的杰作。

在此意义上,批评家又是收藏家,他在空虚、浮躁的信息海洋中寻找那些有价值的碎片,加以收藏。本雅明热情洋溢地宣扬收藏的好处:“一个收藏家记忆中最精彩的时刻是拯救一部他从未曾想过更没用懂憬的目光流连过的书,因为他瞥见此书孤零零地遗弃在书市,就买下,赋予它自由。这犹如《天方夜谭》中的王子买到一个美丽的女奴。”^{〔21〕}批评家在赛博空间中不断地寻觅、发现,他总有让人惊叹的意外之喜。这是一种“拯救”,是让有价值的作品在信息海洋中崭露头角,恢复其个性、尊严与自由。由此,批评家就符合了阿伦特对本雅明其人及思想的深刻概括——“深海采珠人”。“正如采珠者潜入深海不是去开掘海底,让它见天日,而是在深处撬开丰富奇瑰的藏物,获得海底遗珠和珊瑚,将其带出水面。”那些被人忽视与遗弃的杰作,尽管受到“时间浩劫的摧败”,但“颓败的过程同时也是结晶的过程”,它们“仿佛在等待采珠人有朝一日下访探问,将其作为‘思想的断片’,作为‘丰富而瑰奇的珍藏’,甚至作为永恒的‘象中之象’,带回到生者的世界中”^{〔22〕}。作为“深海采珠人”,批评家潜入赛博空间的海底,在大量的商业性的同质写作之外去找寻那些真正保留文学个性,以此重建内在经验,恢复文学的本真含义。这既是瓦解也是维护,既是批判也是去蔽,既是意识形态的指责也是对乌托邦梦想的存留。批评家的“收藏”与商业网站的“占有”不一样,后者为了获利而以金钱法则切割文学、绑架作者,而批评家则对作品“去蔽复魅”。“获取书籍的寻常手段中,最适合收藏家的是借了书意味着不归还。”^{〔23〕}收藏家以“不归还”的方式保留作品的本真,避免让它重新落入物质与商业的大潮,这正是重建文学意义的绝好手段。

寻找、审视、发掘与维护文学碎片,——这种批评策略,也就是本雅明所说的“寓言式批评”(allegorical criticism)。他力求在“最微贱的现实呈现”中,即在支离破碎中,“捕捉历史的面目”^{〔24〕}。本雅明的

寓言式批评,显然是试图缓解卢卡奇的焦虑,即如何在碎片化的现代世界中重建人与历史的关系。在卢卡奇那里,叙事成为个体与世界之间寻求和谐的一种手段,成为在碎片化的现实中进行总体性把握的一种努力。本雅明反对卢卡奇的以个别体现整体的象征性观念。对他来说,唯一的总体性是没有中介的总体化,是以单子的方式显现“非连续的无限”。他推崇寓言式批评。寓言与象征不同。象征意味着一个有机的、自足的意义世界,在其中,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短暂性与永恒性完美地结合,局部只有在整体中才能获得意义,部分只有在与大写的理念秩序相关时,只有当它构成一个恒常的持续前进的历史运动时,它才合法有效:“所有细节都无足轻重地标志着这个世界的特点。”⁽²⁵⁾当下、瞬间、个别事物不断地重复与雷同,它们失去了各自在整体中的位置:“在寓言的直观领域里,形象是个碎片,一个神秘符号。当神性的学问之光降临它身上时,它作为象征的美就蒸发掉了。总体性的虚假表象消失了。由于表象的消失,明喻也就不存在了,它所包含的宇宙也枯萎了。”⁽²⁶⁾本雅明的“野心”是“在世俗世界的‘堕落的具体性’中夺取思想的战利品,并由此把空洞的时间再造成充满意味的寓言空间。这迫使他在一种‘物的意义上’去联结四分五裂的历史,征服异质性的‘残片’”。⁽²⁷⁾对批评家来说,面对碎片化的赛博空间,他并不试图用宏大的、抽象的总体原则去重新归拢一切,而是保留现象学的丰富性,突出碎片本身的意义,让这些各自为战、彼此隔绝的历史碎片,成为言说历史的唯一材料。

三、“认知测绘”、“总体性”与整体研究

碎片化的赛博海洋让批评家难以弥合自我的现实经验与文学整体结构的深刻裂痕。他可以做一名“深海采珠人”,进行“寓言式批评”,捕获那些被遗弃的文学断片,在东鳞西爪的具象中窥视历史面目的些许斑驳暗影,但这并不意味着拒绝对纷扰的文学现象作整体观照,要避免的只是那种强制的还原性的总体性。在詹姆斯看来,尽管后现代空间出现了“表征”危机,但我们仍“必须从破碎、分裂、异质的后现代文化元素中,努力挽回被压制的集体经验的最小残余,此集体经验将允许我们去再次思考对资本主义全球系统的抉择”。⁽²⁸⁾为此,他提出了“认知测绘”的概念。

据王逢振先生回忆,詹姆斯早在1983年就拥有了“认知测绘”的说法。詹姆斯认为:“认知测绘的计划不论成败,都与某种(无法表现的、想象的)关于全球社会整体性的概念密切相关,而对这种整体性确应该进行认知的测绘”。他明确强调,“必须对电脑等‘再生产技术’所造成的全球化的超空间进行‘认知测绘’”。⁽²⁹⁾詹姆斯的“认知测绘”受到地理学家凯文·林希的影响,这一概念出自后者的《城市的意象》(1960)。在此书中,通过对美国一些大城市的调查与采访,林希指出了城市的异化给人们的认知绘图带来的不利影响,即自我难以弥合在城市中现实的地域感与对城市的整体感知之间的断裂。在詹姆斯看来,林希构想城市经验的方式,即局部的直接感知与把城市作为一个缺场的总体性的想象感知的辩证法,与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就是“对主体与其真实生存关系的想象再现”的理解颇为相似。“认知测绘”试图让局部与整体、个人的认知经验与总体性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从整体上把握后现代文化,以免主体在表面上各自孤立的纷呈万象中迷失自我,从而忽视了现象背后资本总体性的客观事实。在詹姆斯看来,认知测绘并不是如后结构主义所攻击的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模仿”或“再现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它提出的理论问题使我们能够在更高的、更复杂的层次上对再现重新分析”。⁽³⁰⁾后现代思潮把零碎化、片面化无限夸大,完全拒拆总体性,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只要资本存在,资本向全世界扩张的事实继续存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的总体性观念就仍然合法有效。认知测绘被要求做的就是:“使主体能对那更广大的以及相当不能再现的整体,作出情景再现。”⁽³¹⁾显然,对赛博空间中的批评家来说,詹姆斯的“认知测绘”概念具有重要启示价值,意味着他必须从整体上把握赛博文学的特征、趋势与走向。

在詹姆斯看来,“地图”的高级形式是航海指南、海图或罗盘地图等等,因为罗盘、六分仪和经纬仪等仪器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协调”思想,即对“整体的关系”的强调。⁽³²⁾对批评家来说,互联网也有一些旅行图表与简易标记,如网站对栏目和板块的清晰划分、搜索引擎的使用、网民的点击率与跟贴、版主的加精与置顶、专栏文章的推荐与热评等,这些“标记”显然能让批评家在作品海洋中更为迅捷地定位、鉴别与筛选,但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他不能满足于零敲碎打,必须对复杂的赛博文学现象作总体把握。古希腊神话中的代达罗斯被困迷宫,他靠制造翅膀飞上

天空,超越了迷宫的陷阱而成功地逃脱。詹姆斯的“认知测绘”也要求批评家“飞起来”,即强行从无距离的沉浸中起身,拉大与批评对象的距离,从宏观上、整体上对网络文学展开研究。进一步看,这种整体研究实质上与网络文学的特质有深层的契合。网络文学在题材、内容与形式上呈现出鲜明的类型化、程式化特征,这在客观上也为整体研究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网络文学,特别是那些商业性的读书网站的作品,它们与资本的关系极为密切,是一种相当纯粹的商业化写作,尽管这些作品表面上万象纷呈,不易把握,但它们在根本受到那个终极的“缺场的原因”,即资本的宰制,而这与詹姆斯强调从资本、从生产方式上去把握后现代文化的急速演变,从而获得相应的整体感知是一致的。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说“寓言式批评”往往是去发现、收藏那些散布、遗失在各种论坛的文学爱好者基于兴趣的写作,整体研究则对那些以盈利为目标的读书网站上的网络写作更为有效。

值得注意的是,詹姆斯的总体性不是以忽视个别的复杂性与差异性,还原性地把它们统一到某个宏大逻辑之下,而是给这些各自为阵的散兵游勇提供统一的历史背景,这是开放的、流动的、处于建构中的;内部包含了各种存留的和新生的反作用力和新趋势”并“预设了差异”的总体性⁽³³⁾。显然,詹姆斯的总体性借鉴了后现代理论反对僵化的二元对立、反对非历史化与本质化等观念,但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强调碎片之间互不相容。如果不借助机械性的还原性暴力,碎片就不能被整合进某一更大的整体;而詹姆斯则强调现实终究是可以理解的一个知性整体:“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采用了总体化的分析模式,而在于是否提出了一种过于抽象的总体,是否建构了过于简单、直接、无中介的相互关系。”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去使用恰当的中介,建构出足够复杂精密的框架,使之能够以非还原的方式完整地图绘出文化文本和社会实践的复杂性。”⁽³⁴⁾批评家必须辩证地整体研究网络文学,尽管网络文学呈现出类型化的特征,但其价值观也是多元化的,必须注意到其差异性、流动性;尽管网络文学深受资本的宰制,但也不能忽视各种中介因素,必须考察网络文学与各种政治思潮、社会心理与文化时尚之间的隐秘关系,实现“符码转换”,而不能简单、机械地把它们与生产方式

相联系。

[本文为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数字媒介与文学批评的转型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C51039)及“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白烨《有限性与可能性——传统批评与网络文学》,《南方文坛》2010年4期,第20页。

(2)洪治纲:《信息时代:文学批评的挑战与选择》,《南方文坛》2010年6期,第21页。

(3)Foucault, Michel: Questions on Geography 'In 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Pantheon Books, 1980, p70。

(4)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 Smith, Blackwell, 1991, p26。

(5)(13)王逢振主编《詹姆斯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298页,第298-299页。

(6)谢少波、王逢振主编:《文化研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7)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5。

(8)(9)(10)(15)(16)(17)(18)(19)[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才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第120页,第33页,第45页,第40页,第13页,第79-80页,第118页。

(11)[美]詹姆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87页。

(12)(14)(30)(31)(32)[美]詹姆斯·《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200页,第181页,第208页,第209页,第209-210页。

(20)[法]波德莱尔《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页。

(21)(22)(23)(24)《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5页,第68页,第73页,第30页。

(25)(26)陈永国、马海良编《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第136页。

(27)张旭东《现代“文人”本雅明和他笔下的波特莱尔》,《读书》1988年11期,第83页。

(28)[英]肖恩·霍默:《弗雷德里克·詹姆斯森》,孙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29)王逢振:《詹姆斯近年来的学术思想》,《文学评论》1997年第6期,第145页。

(33)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edited by Douglas Kellner, Mouton Press, 1989, p380。

(34)[美]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孝感学院文学院)